

西藏全区生产总值连续2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本报拉萨3月28日电 记者代玲报道：今天，西藏各族各界群众3000多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纪念百万农奴解放57周年“升国旗、奏国歌”活动。

“从给‘三大领主’当牛做马到自己买车、出门坐车，从生病无人管到享有免费医疗，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都太大了！”来自拉萨市城关区藏热社区的翻身农奴家庭代表格桑平措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

格桑平措朴实的话语，是西藏人民生活改善的真实写照。现在，格桑平措所在的藏热社区群众冬天用上了暖气、天然气，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已成了这里群众日常生活的标配。

近几年，西藏大力扶持旅游文化、天然饮用水、清洁能源等强区产业，加快培育高原种羊、藏医药、藏族特色手工业等富民产业，还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提升发展动能。

数据显示，2015年，西藏经济增长速度逆势上扬。去年，西藏落实固定资产投资1342亿元，贷款余额突破2100亿元。西藏全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增长11%，连续2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拉日铁路建成运营，拉林铁路全面开工建设，公路总里程达7.8万公里；电力装机容量达230万千瓦，行政村实现移动信号全覆盖，通宽带率达80%。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西藏将更多的财力投放到民生建设领域。

2015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57元，比“十一五”末增长6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244元，连续1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在全国率先实现了15年免费教育，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免费健康体检。

“十二五”时期，西藏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642亿元，比“十一五”增长1.8倍。青藏、川藏电网实现联网，主电网覆盖58个县。一大批

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项目开工建设或建成投产，基础设施、城乡面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伴随着林芝等地桃花的盛开，西藏的旅游季悄然来临。自驾游旅游的林芳女士一家，在欣赏完林芝的桃花海后，前往下一站拉萨。“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以前听说西藏交通不好，318国道沿线更是经常堵车。这次旅行中，我觉得西藏的交通比我想象中好很多，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

走进距离拉萨1000多公里的林芝察隅县上察隅镇体育村村民如铁龙的家，除了漂亮的傣人新居，客厅里硕大的皮沙发和各种电器一应俱全。在援藏项目的帮助下，仅靠养猪一项，如铁龙一家7口去年的纯收入已达到8万元。截至今年3月份，如铁龙家已经有了6万元的收入。

如今，西藏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生态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站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消费升级为导向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多因素推动消费升级 大众新消费时代来临

消费升级加快很大程度上是我国新阶段新常态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城镇化加快推进、互联网日益普及的必然结果，更是党和政府供需结合、因势利导加大惠民政策力度的效果体现。

一是大众新消费时代必然伴随消费升级。经济学家罗斯托在总结发达经济体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起飞”几十年后，产业体系具备了快速吸收和使用现代技术成果的能力，进入“成熟”阶段，多数国家很快开启大众新消费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汽车、私人住宅等耐用消费品和大众化服务进入普通家庭，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由工业成就转换为消费和福利问题，社会资源也更多地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大众服务供给，居民消费成为引导结构变动的主要动力。对照现实，近几年我国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已成为大众消费热点，生活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消费升级明显加快。从产业结构看，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趋于“成熟”，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工业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41.8%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33.8%，第三产业比重由41.9%逐步上升到50.5%。从全球分工格局看，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突出，世界大部分工业行业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贡献。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我国已经进入大众新消费时代，这个时代必然伴随着消费升级加快，这既符合产业成长的一般规律，也与消费升级的国际经验相吻合。

二是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为消费升级提供了支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收入不断增长，消费升级才有基础。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不同层次，只有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居民收入增长连续“跑赢”GDP，为消费加快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至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8%，比GDP年均增速高0.5个百分点。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5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2012年减少4324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基尼系数持续下降，2015年下降为0.462，为近13年来新低。

三是城镇化快速推进为消费升级拓展了空间。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中，本身就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城镇生活的快节奏，使居民更多地依靠购买而不是自给自足来满足日常所需，由此带动餐饮、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人口的集中也使得一些规模经济门槛较高的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为医疗卫生、法律咨询、教育培训等专业技术服务和公共服务创造了巨大需求；人口的集中还大大加

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利于加速新产品、新服务、新消费热点的成长。2013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由53.7%上升到56.1%，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据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约1.8个百分点。

四是互联网日益普及为消费升级创造了技术条件。互联网的普及使沟通变得空前便捷，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从上百商家挑选到心仪的商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下降推动消费频率大幅提高，个性化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信息传播的加快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还加速了各行各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发挥。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技术的推动，才使得通信、零售等消费领域的新业态层出不穷，消费方式日新月异，而人口大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特殊优势也使我国的消费升级故事比其他国家所讲述的更为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网络的普及和支付方式的创新撬动了网络消费的大市场，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线上销售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实际消费量较传统方式增加约20%。

五是供需结合的宏观政策为消费升级塑造了良好环境。为推进消费升级和增加有效供给，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加强供求管理，既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又积极促进消费升级。面对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坚持创新宏观调控，注重挖掘消费潜力。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使资源向消费升级相关领域集中；扎实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力催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兴经济的蓬勃发展；“营改增”及利率市场化等重大改革，进一步降低了服务业发展成本；推出六大消费工程包，有效引导社会资金向新消费领域聚集，增强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有效促进了消费升级。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消费升级引领经济稳定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运行任务十分艰巨，唯有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积极培养新消费为主体的新动能，才能促进新旧动力有序转换，实现结构优化升级。我国消费潜力巨大，空间广阔，但由于供给结构满足不了消费升级的需要，抑制了消费潜能释放，消费外流现象严重。为此，要以促进消费升级为导向，进一步优化宏观经济政策，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消费升级空间十分广阔。无论是从城镇化发展阶段，还是从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来看，我国消费潜力

都很大。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0%，而发达国家多在80%以上；我国最终消费率只有52.8%，而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都在75%以上，韩国也在65%以上。我国人均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2015年，每千人拥有私家车约为100辆，而美国、日本2012年分别为781辆和593辆；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2014年，我国每百人拥有铁路8.2米，仅为美国2012年水平的11.3%。

有效供给不足制约消费潜力释放。我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供给能力十分可观，全球500多种工业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供求错配现象比较严重，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而新兴领域有效供给不足，国内供给无法跟上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一方面，消费外流现象比较严重，2015年我国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2万亿元；另一方面，消费升级潜力未能充分释放。我国产品质量总体不高，质量监督标准较低，消费环境不佳，加之存在产品的假冒伪劣，特别是医疗、养老、健康等服务消费供给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制约了消费升级。要使境外消费有序回流，释放消费升级潜力，必须从供需两端发力，尤其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消费升级为目标，加强政策引导。目前我国消费升级及新经济孕育成长正处在关键阶段，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入推进中，迫切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瞄准靶心，加力增效。建议以消费升级为目标，优化宏观政策，为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一是要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准入限制，打破行业垄断，尤其是全面放开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短板领域。二是要优化消费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为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提供更多的便利。实施更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监管措施，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严惩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尤其要加大对农村电网电信改造、城市地下管廊、城乡养老健康、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资建设，为消费升级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四是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收入增长政策，要进一步织牢民生保障网，有效化解去产能过程中带来的职工下岗压力，要继续推进创新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增加收入。五是要深入推进科技、财税金融、国有企业和价格等重要领域改革，从根本上破除制约供给创新和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用新理念指导新实践，将中央确定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的《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企业界、学术界人士，他们认为，此次科协系统改革不是“零打碎敲”，而是全面系统深入的“刮骨疗伤”，改革将进一步密切党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激发创新活力，为决胜“十三五”汇聚智力。

抓住改革“牛鼻子”

作为联系全国7000多万科技工作者的群团组织，科协的联系作用，主要通过各学会来实现。此次改革中，学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改革，被称为改革的“牛鼻子”。

“学会是科协的组织基础，学会工作是科协的主体工作。”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苏小军说，在学会改革方面，主要是完善科协团体会员制度，改革学会领导机构设置，鼓励学科相近、联系密切的学会成立学会联合会等。

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穆荣平教授表示，学会秘书处专业化队伍的建设，将让学会更加独立，走向社会化。“这是很重要的探索方向，有助于让学会真正成为联系科学家、服务科学家的科学家之家”。

“生命科学跟医学、农学、药学都有关系，牵扯到全国范围的20多个学会，联合体的成立克服了专业分工偏窄偏细造成的不足。”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陈晔光说，现在学科发展交叉融合是趋势，无论是学术交流，还是向老百姓科普转基因、干细胞等热门话题，又或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等工作，都是单一学会没法做，而学会联合体可以做到的事情。

聚力科技工作者

对于广大科技工作者来说，科协系统的改革，将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讲师崔鹏对此充满信心。

本次改革中，科协将把资源更多配置到基层一线，去年开启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崔鹏就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

“去年，我收到两个计算机领域权威专家的邮件，问我年龄是否符合‘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要求。”崔鹏说，看到相关介绍后，他很激动，一是方案明确指出该计划针对“小人物”，二是项目名称叫“托举工程”。

“作为一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我希望作出更大的成绩。”崔鹏笑着对记者说，当前的很多人才计划都是先让人才自然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再通过竞争遴选，对青年科研人员有计划、有目的培养方案相对欠缺，“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恰恰弥补了这一空白。

的确，被托举的人才可能是千里马，而推荐他们的学会就是伯乐。学会有一批老科学家，十分关心年轻人才的成长，他们甘为人梯，乐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悉心指导。

科协系统的改革，不仅为了培养优秀青年人才，更重要的是突出科技工作者主体地位，紧密联系一线基层科技工作者。《方案》就明确提出要将科协全委会基层一线委员的比例调整目标由现在的58%提高到70%左右，将常委会基层一线委员由现在的56%提高到75%左右。

开放服务大平台

《方案》还进一步强化了对科协提供科技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以扩大科协及所属学会的社会影响。

“学会要面向基层、面向中国的草根阶层，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强大辐射力，产生推动中国繁荣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南宁教授向记者介绍了中国科协于2014年10月起实施的“创新驱动助力工程”，认为“学会应该把学术研究和创新驱动战略结合起来，为企业需求提供雪中送炭的服务，而不要把学会办成又一种只注重学术的高墙深院”。

“工程实施以来，中国科协及所属学会跟我们企业对接了很多次。”作为“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的受益者，河北荣毅集团总经理苑宝义说，在中国科协的推动下，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光电网创新平台和光电网产业联盟，成立了一个基金——光电网产业基金，最终推动了国家光电网产业的发展。

通过全面系统的深化改革，科协组织将树立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的新定位新形象，服务全社会创新需求，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之家。

（上接第一版）在漳州市城乡大病保险服务中心一楼大厅里，记者看到5名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电脑审核患者就诊资料。运作此项目的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总经理柯绿草告诉记者，为运作好这一项目，人保公司组建了30多人的专业队伍，通过各级保险机构将服务延伸到农村，农村患者只需把就诊资料提交到县级新农合中心，就可以在家中坐等理赔资金打到银行卡上。

同时，为防止医院不合理用药、打击黄牛鼓动部分人骗保的行为，该中心还专门成立了“新农合基金使用稽核管控中心”，稽核人员全部为医疗专业毕业生。一方面，他们借助新农合医疗信息系统对参合患者就诊情况实时监控，一旦发现异常就医信息，立即进行追踪、干预。另一方面，他们每天不定时、不定医疗机构随机持证巡查住院情况，查处虚假住院、虚假治疗、小病大养、住院挂床等虚假医疗行为，确保新农合资金的安全。陈大通表示，漳州市3年共筹资大病补充投保资金3.29亿元，但保险补偿金额就达到了3.38亿元，3年来亏损900万元左右。保险公司参与此项目，最多只能做到保本微利，而且还要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那为什么保险公司还会积极参与呢？柯绿草说：“对人保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来说，

服务社会、服务民生、参与社会管理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这一项目让全市4.4万农民受益，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柯绿草坦言，保险公司实际上也获益匪浅，最重要的是此举培养了广大农民的保险意识，而且使人保公司在农村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进而带动了公司农村保险的较快增长，实现了农民、保险公司、政府的共赢。

漳州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刘育萍说，目前，漳州市新农合制度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340万农业人口中的99.97%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2016年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达到530元，其中，农民个人只需缴纳120元，其余由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进行补贴，大病医疗无需额外缴纳费用。漳州市还实施动态管理，适时调整方案，提高大病保险比例，赔付线由2012年的1.5万元下调到9000元，最高赔付比例达80%；包含基本医疗保障在内的最高封顶额也由2013年的35万元提高至40万元。

当万安表示，漳州市的农村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将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以便更多的农民能够享受更高的医疗保障，大幅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同时也将继续研究扩大可报销药品范围，广大漳州农民有望彻底告别“看病贵”。

本报记者

科协系统深

余惠敏

服